

“深挖洞”的

SHENWADONG DE BEIHOU

SHENWADONG DE

背后

谭克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深挖洞”的

SHENWADONG DE BEIHOU

SHENWADONG DE

背后

谭克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挖洞”的背后/谭克明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098-0437-7

I. 深… II. 谭… III. 人民防空—史料—中国
IV. E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6011 号

书 名: “深挖洞” 的 背 后

作 者: 谭克明

特邀编辑: 陈贵堂

责任编辑: 贾京玉 于国宁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2mm×235mm 1/16

字 数: 337 千字

印 张: 23

印 数: 1—9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437-7

定 价: 39.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前 言

“深挖洞”，这个战备口号大家并不陌生。但“深挖洞”，这个曾经席卷神州大地，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一场群众运动，缘何而起，当年盛况，后来发展，未来走势……需要深入的了解。

“深挖洞”，原本是一个战争话题。纵观人类战争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攻与防、矛与盾相互促进、交替发展的历史。兵器的发展，促进了防护技术的提高；防护技术的发展，又刺激了兵器性能的改善。在冷兵器时代，一座万里长城足以抵挡刀枪剑戟的进攻；火药兵器的出现，催生出炮台要塞式防御体系；而热核武器的诞生，“深挖洞”，便成为现代防御的主要手段。因此，“深挖洞”是现代防护工程建设的代名词。

防护工程由国防工程和人防工程两大部分组成，共同构成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国防、抵御侵略的有效盾牌，也是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依托。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防护工程建设，将其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当前进行的反恐战争都雄辩地证明，防护工程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护工程建设，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防护工程体系，为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赢得建设发展的和平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挖洞”，也是一个经济话题。防空洞既是防御工事、又是地下资源。平战结合，战备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举，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建设的发展趋势。

地下空间具有独特的优势。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在不扩大或少扩大城市用地的前提下，实现城市空间的三维式拓展，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节约土地资源，缓解城市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建立完善的城市地下防灾空间体系，保障城市在战争灾害、自然灾害和人为重大突发事件时的安全，实现城市的集约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始于人防工程建设。由于贯彻了人防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方针，使人防工程除了战备效益外，还充分发挥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当前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的主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数量快速增长，体系不断完善，特大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总体规模和发展速度已居世界同类城市的先进行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大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速度已居世界首位，城市地下快速道路建设已经起步并将加速发展，城市地下物流系统已着手研究，城市大型地下综合体的建设已经成为许多大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亮点，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本书作者是一位具有37年军龄的现役军官，长期在施工部队和总部机关工作。他热爱自己的兵种，酷爱自己的事业，潜心收集了大量的资料，采访了众多的人物，以翔实的史料、精巧的构思、生动的笔触，对新中国“深挖洞”的伟大实践作了一个全景式的记述，生动再现了“深挖洞”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深挖洞”的辉煌成就，热情讴歌了“深挖洞”的火热生活和广大建设者的精神风貌，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深挖洞”事业的纪实作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该作付梓之时，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且将《深挖洞的背后》一书作为献给祖国母亲的生日礼物，并祝愿我国的“深挖洞”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续写新的历史篇章。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提出“深挖洞” /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人民领袖毛泽东深感严重的战争压力，号召全国人民多准备几手

第二章 挖洞溯源 /15

从土行孙的地行术说开去。冀中地道战、上甘岭坑道战……热核武器的诞生，“深挖洞”便成为现代防御的主要手段

第三章 挖洞百态 /28

专业队日夜挖，居民轮流挖，学生放学挖，职工下班挖，百岁老太一天到晚盯在挖洞工地上……

第四章 挖洞评说 /43

一场没有公开的争论，群众评说“深挖洞”；一段纵横捭阖的历史，外交评说“深挖洞”；一种严谨科学的探索，专家评说“深挖洞”

第五章 山底洞人 /58

深山是他们的营盘，地心有他们的歌声，战备是他们的职责，艰苦是他们的本分。他们爱大山就是爱江山、守洞门就是守国门

第六章 挖洞转变 /74

钱七虎“分配原子弹”。马恩山游说全国。厦门趟出一条“深挖洞”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第七章 洞为媒 /89

平战结合洞养洞，观念一变天地宽。神奇洞天，千座丽宫，万所华堂；深邃地宇，服务生活，地阔天广

第八章 洞天变换 /104

平战结合工程越建越大，平时好用，战时顶用吗？举国迎敌的大战可能性降低，防空工程平战转换功能如何与时俱进、世代传承

第九章 科技兴洞 /120

现代花木兰——王如芝的核试验生涯。抗爆激波管——模拟核爆的重要手段。洞室围岩研究——防护科研的重中之重

第十章 洞天降龙 /137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存之患，洞天世界需要水，也害怕水。水患有规律，潮湿有原因，治水有技巧，潮湿有克星

第十一章 洞天禁忌 /153

重庆“大轰炸惨案”、韩国“地铁火灾”让人经久难忘。地下工程有许多禁止或忌讳的事项，只有禁必止、忌必讳，方能确保安全

第十二章 洞人有才 /168

“深挖洞”需要人才。“深挖洞”也出人才：省部级领导、院士行列都有挖洞人的身影，国防部长梁光烈当年曾是挖洞人

第十三章 洞天护航 /183

“深挖洞”也要讲政治，施工中的政治工作独具特色。挖洞人具有自己特有的精神素质和传统作风，雷锋、王杰都是工程兵

第十四章 洞天文化 /198

简单原始的文化体育活动成为“深挖洞”的精神食粮。“深挖洞”的火热生活，孕育了一大批文化人才和文化产品

第十五章 洞人历难 /220

“三年自然灾害”，10万施工部队忍饥挨饿。建农场度饥荒，盐碱滩变成了米粮仓。白手起家办工厂，自力更生搞经营

第十六章 寓“洞”于教 /236

“深挖洞”是人民防空的物质准备，而精神、素质准备要靠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只有“洞”入思想、“洞”入能力，方能常备不懈

第十七章 依法治洞 /251

开山采石毁坏设防阵地、伐树扒渣破坏工程伪装、易地费可缴可不缴……国防、人防工程亟需立法保护

第十八章 洞天延伸 /266

打击经济目标已成为作战重心。经济目标不可能完全转入地下，防空不仅要考虑地下防护问题，而且要向地面经济目标防护延伸

第十九章 别有洞天 /282

“向地下要地皮”、“向地下要能源”、“向地下要环境”，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地下空间。未来九地之下，别有洞天世界

第二十章 洞天盘点 /297

“深挖洞”是应对战争灾害、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的特殊领域，灾情牵引、技术推动、人才支撑、管理固基是其独特的发展规律

第二十一章 挖洞之最 /313

最高、最早、最大、最长……系统回顾“深挖洞”的重大历史事件，充分展示“深挖洞”的辉煌建设成就

附 录 /326

后 记 /358

第一章 毛泽东提出“深挖洞”

(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毛泽东为中国人民遮风避雨的伟岸身躯，深感严重的战争压力。

毛泽东，这位从人民战争中走出来的人民领袖，他藐视任何侵略者。在他的眼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他曾站在时代的巅峰气吞八荒地说过：“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足见一代伟人的宏伟气魄和英雄胆略。但他对战争一旦突然袭来，原子弹一旦掉下来，如何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如何保存反侵略战争的潜力，一直进行着战略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事待举、百废待兴，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异常险恶。美国企图控制中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敌视的政策。蒋介石集团盘踞在台湾及其沿海岛屿，伺机窜犯大陆。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尽快恢复被战争摧毁的经济，我们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是毛泽东从当时的全球战略格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中国革命同苏联关系符合逻辑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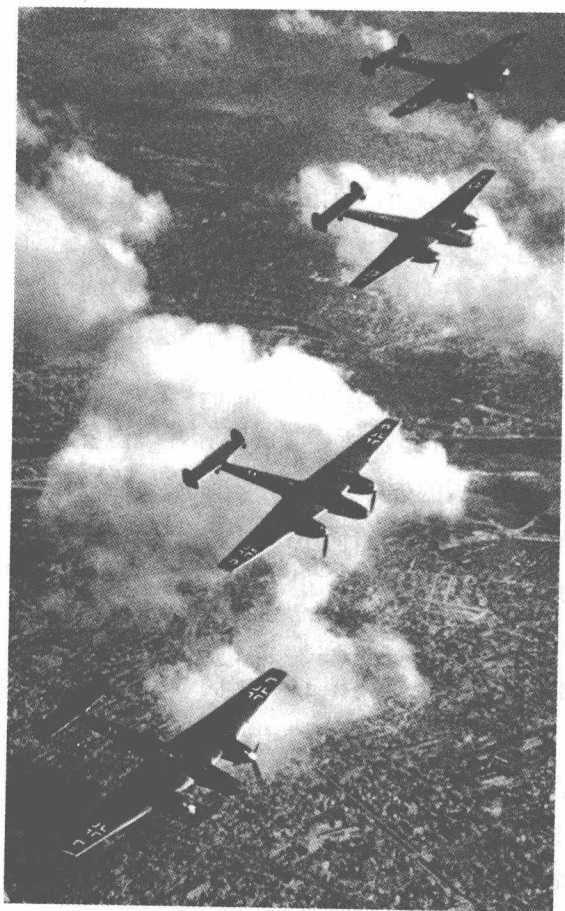
古往今来，战争与和平，都是涉及人类命运和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是制约一个国家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乃至影响国家内外政策、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和基本依据。一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一个致力于和平建设的政党、一个在国际敌

对势力严重威胁之下的国家，不能不考虑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不能不对此作出正确的估计和判断，否则就会招致被动挨打、甚至亡国灭种的灾难。

毛泽东洞悉国际形势，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判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进行工作，一方面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

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迅速烧至鸭绿江边。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希望再卷入一场战争。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利益正日益遭受损害。朝鲜政府也恳请中国出兵援助，共同反对美国侵略。唇亡则齿寒。毛泽东为此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中国安全和



轰炸机飞临城市上空

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但毛泽东这时更多地认为大仗一时打不起来，中国可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

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分析，认为战争的威胁处于次要方面，战争威胁的来源，主要来自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随着我军在东南沿海地区军事力量的加强，战争“可以避免”、“可能推迟”。但同时也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还存在，就应当看到战争的可能性，就应当有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如果不够地估计到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危险的。深谙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看问题从来都是两分法。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又不得不作出新的判断。

东面，美帝国主义认为中国大陆处于政治和经济困难时期，有机可乘，便支持台湾国民党集团对大陆进行空中和地面的袭扰行动。造成东南沿海地区十分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

西面，麦克马洪线，风云突变。印度自恃有美、苏撑腰，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台湾又在着手反攻大陆，认为进行军事冒险的机会到了，从1959年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不断在我边境地区制造武装冲突事件。1962年10月在中印边境全线发动向中国的进攻，毛泽东不得不根据情况，部署一定的力量来反击印军的挑衅，保卫西部边境的安全。

南面，1961年，美国在越南发动了“特种战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是美国企图以越南做跳板侵略中国。到了1964年8月，美国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对北越进行疯狂的轰炸和袭击，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户破则堂危。毛泽东又不得不作出了援越抗美的部署。

北面，中苏关系从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裂痕在逐步加深。苏联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开始在军事上对中国施行高压政策。



铁路遭轰炸

1958年苏联提出了与中国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损失。在施用政治和经济压力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苏联便开始对中国搞一些小动作。1962年，苏联在我国新疆策动了暴动事件，胁迫伊宁、塔城地区6万余边民外逃。接着，在中苏边境增加了兵力部署，使毛泽东感到北面军事威胁在增大。

两个超级大国同时施压，中国四面受敌，使毛泽东为中国人民遮风避雨的伟岸身躯深感严重的战争压力。看起来战争是不可避免了，必须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增强备战的紧迫感。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

(二) 中国人的头上始终悬着核大棒。毛泽东从最坏的可能出发，号召多准备几手，一个个战备措施出台。

在台湾海峡的另一面，蒋介石集团也在勾画它的生存发展战略。他想

偏安一隅，但毛泽东“一定要解放台湾”，使他不得不寻求美国人的保护；他还想反攻大陆，但力所难及，又不得不仰仗美国佬撑腰。于是，他也采取“一边倒”的战略。不过，毛泽东的“一边倒”，是独立自主的一边倒，如果谁想借机控制中国，就敢于与他决裂，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蒋介石的“一边倒”，却是挟洋自重、仰人鼻息。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系列加强援台法案。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据美国政府已解密的总统批准的NSC-162/2号文件称，美国要继续进行遏制政策，但却要更依赖战略空军的威力。不久，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柯蒂斯·梅勒将军便明目张胆地向全球吼叫：“在朝鲜没有适合于战略空军的目标，然而我会在中国适当的地方如满洲和俄国南部投下几枚核炸弹。在这些‘扑克游戏’中，我们应该下大赌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上将在美台条约送交参院投票表决时，说得更直截了当。他上书总统说，如果台湾海峡出现危机，建议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1955年3月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刚从台湾出访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进行了一次两人单独密谈。据30年后解密的白宫备忘录披露，两人当时在密室商定，如果金门、马祖的危机继续发展下去，就要对红色中国施行“核”手术，使其变成第二个长崎、广岛。

同年3月18日，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向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他颇带弦外之音地称，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为“和平”服务。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美国老百姓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从此，美国的战争边缘和核讹诈政策出笼，在世界人民头上罩上了核乌云，预示着人类“核冬天的来临……”

另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中国人的头上挥舞核大棒。那是1969年9月11日，就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半年后，中苏边境剑拔弩张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为时190分钟的会谈。柯西金带着威胁的口气说：“难道想与苏联打核战争吗？要知道，我们只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将你们打回石器时代。”叛

逃到西方的克格勃高级官员施甫琴柯曾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文透露,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以后,确实考虑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突击空袭,已让苏联在亚洲地区的35个导弹基地的核弹头瞄准了中国的导弹基地和重要的城市目标,并曾试探过美国的态度。1970年6月,在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中,苏联的首席代表向美国代表递交的备忘录中建议,如果出现第三国的“核挑衅行动”,苏、美有责任对挑衅国家采取“报复行动”。这实际上是建议苏、美两家联合对中国实行核攻击。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了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减弱其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态势,对其采取了绥靖政策,当然希望中苏军事对峙越紧张对其越有利。

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威胁下的中国,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粉碎霸权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最坏的可能出发,多准备几手,从各方面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一个个战备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并迅速付诸实施。

首先是利“矛”,加快核武器研制步伐。

马克思主义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去摧毁。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并以一代伟人的气魄和胆识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当有人讽刺我们国家太穷,就是当了裤子也搞不出原子弹时,元帅外交家陈毅以他豪爽的天性慷慨陈词:“宁要原子,不要裤子。”

具体负责抓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张爱萍在谈到研制工作的意义时更加形象地说:“叫花子还要有一根打狗棍呢!”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苏联中断援助,国内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在原子弹研制处于困难时刻,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加强了研制核武器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勒紧裤带，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集中力量研制核武器等战略武器。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了“两弹”的攻关，每到研制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都作出重要指示。1964年9月，毛泽东对前去汇报的周恩来和刘少奇说：“原子弹是吓人，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1964年10月16日，经过广大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紧接着，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研制试验成功，中国从此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1967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零8个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从1967年5月至1978年，中国的核潜艇、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相继完成试验。

中国的战略武器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这些武器的研制成功和装备部队，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打破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工农兵认真学习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的核威胁、核讹诈，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其次是坚“盾”，加强“三北”地区的设防。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前，中国的军事工程建设重点在东部沿海地区。

1950年12月，朱德总司令就组建工兵司令部的有关事宜，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工程兵的任务之一就是“构筑国防要塞”。

1952年8月，中央军委作出了建筑国防工事的决定。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战略要点和重要作战方向，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国防工事。

1953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两次召开会议，组织讨论对敌军事斗争和军事部署问题。并且跋山涉水，勘察了沿海主要设防地域，确定了设防工程部署。

1963年2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福州召开岛屿战备工作会议，提出在重点设防的原则指导下，在一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能牵制敌人、起枢纽作用的岛屿上，重点建设一些阵地工程。经过加强岛屿工程的建设，东部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初具规模。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针对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央军委决定在“三北”地区建立国防工程体系。

1964年9月11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对华北地区进行勘察。之后，总参谋部对“三北”设防工程作了具体的部署。根据这一部署，北京、沈阳、兰州、新疆等军区从此开始担负起了进行“三北”地区国防工程建设的任务。在重要的交通枢纽部位，有战术、战役价值的要点，构筑坑道等野战和永备工事。许多险峻的山岭，许多边远山沟，通进了战备公路，筑起了工事、坑道。这些工事都达到了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袭击的要求。

1965年底，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军国防工程会议，强调国防工程建设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前沿与纵深的关系，重申了重点设防的原则。要求在敌人必经之路、卡口要点、重点坚守地区等关键地点加强国防工程的建设。

再就是增强战争“潜力”，进行大、小三线工程建设。

所谓“大、小三线”，是中央出于战略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主要是指东北和沿海各省；三线是指西南、西北地区，包括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等11省，从地理位置上划分，主要是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二线是位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的三线亦称为大三线。各省又都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对其中的三线称为“小三线”。

进行大、小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这项工程投资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共和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按照这一方针，实际上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实施一次西部大开发。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在十几个省共投入几百万人力，在祖国的内地，建成了一大批有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主要有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工业基地体系，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贵、陕、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在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等10条干线铁路；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重点企业和基地，如能源工业中的贵州六盘水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等；以重庆、攀枝花、酒泉为中心的三个钢铁工业基地，西昌、河西军垦区为主的农业基地等。

这次大调整大建设，使国家生产力布局趋于合理，不仅适应于备战，而且为开发内地经济建设起到了骨干作用，大大改变了内地经济落后的面貌，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实践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这一战略决策，这一加强战备的战略部署，是十分英明和富有远见的。